



# 曾国藩评传

刘忆江 著

经济日报出版社



# 曾国藩

评传

(下)

刘忆江 著

## 上

## 序

1

## 一、白杨坪曾家

1

嘉庆十六年（1811）十月十一日，湖南湘乡白杨坪的一户曾姓人家，生下了长房长孙。谁也不曾想到，这孩子成年之后，能考中进士，而曾家也将随着他的脚步，从世代耕种的农户，一跃而成为名门世家。

## 二、京师居，大不易

21

京宦十二年，进学修业大有所成，官居二品的侍郎曾国藩，还乡之际，一身旧债，两袖清风而已，曾国藩可称清官矣。

## 三、曾剃头

67

治乱世的前提是除暴安良，这是曾国藩一贯的理念。所谓积玩之后，振之以猛；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，即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……曾国藩的严酷，为他博得了“曾剃头”的绰号，但也稳住了湖南的局面。

#### 四、衡阳建军

119

对于帮办仅可用于自卫的团练，曾国藩并不积极，他招募土生土长的农民，将他们编伍，交与其本乡本土的书生带领，通过严格的军制与训练，终于编练出一支富于朝气的新军——湘军。

#### 五、靖港之羞

165

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。曾国藩的东征檄文，表明他已超越了一家一姓皇朝兴衰嬗递的局限，将与太平天国的这场战争视为护卫传统、保卫中华文化之战。

#### 六、东征：在战争中学会战争

211

湘军东征连战连捷，如风卷残云般在十个月内席卷两湖，成为太平军闻之色变的劲敌。其战斗力不仅得益于曾国藩为湘军制定的营制与军事准则，更有赖于战争实践的磨练与成就，这支由农民与书生结合而成的军队，是在战争中学会战争的。

#### 七、赣江之厄

249

湘军挟全胜之势，急于求成，大意轻敌，冒进浪战，致使陆师顿兵坚城，水师被截分为二，主客易势。此后两年，湘军于江西陷入被动苦战。饱经忧患的结果是，曾国藩在军事上更为成熟，也更为谨慎了。

#### 八、大转机

293

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史上根本的转折点，诸王头上的神圣光环至此消散，天国中人人同为兄弟姊妹的神话亦在空前血腥的屠杀中破灭。此后的天国，躯壳虽在，但已没有了奋斗目标，在精神上已然死亡。

**九、转战安徽**

357

三河之败，使东征战局再生变数，曾、胡携手苦战，于太湖之役遏阻住了太平军的势头，又以天堂奇兵挫败了太平军解围安庆的战略。而杭州的失陷，江南大营的崩溃，使得东南战局的千钧重担，终于压到了曾国藩的肩上。

**十、宿松群英**

391

曾胡左李并称中兴四大名臣，而他们四人聚会一堂，在宿松共谋东征大计，乃机缘凑成，仅此一次。宿松之会，坚定了湘军领袖们的意志，统一了认识，对即将到来的困难局面作了充分的心理准备，从而决定了日后军事的走向。

**下****十一、祁门之困**

431

湘军兵困祁门，从曾国藩的日记中，我们看到这位外表镇静，指挥若定的大帅，无日不在忧危之中，那种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般的感受，实非局外人所能揣度。缺乏心理层面的认知，后人对历史伟人的了解，只能是表面的与肤浅的。

**十二、咸丰之死**

471

一场本可以不打，也不应该打的战争，导致了空前的丧权辱国与咸丰皇帝的死亡，由此引发了政局的突变，自强运动乘时崛起，对中国社会之转型，起了潜移默化的推动作用。改良主义犹如一阵微风，起于青萍之末，正在波澜不惊地潜入中国人的生活。

**十三、走向覆亡的天国**

523

后期太平军军纪荡然，所到之处，竭泽而渔，掳掠裹胁，大失民心。高层将领迅速腐化，天京解围失败后，太平军军无斗志，开始成建制地向湘军投降。不过十年，太平天国无论从精神上还是制度上，都已日薄西山，气息奄奄，无可救药地走上了覆亡之路。

**十四、儒帅风采**

571

战争的胜负，除去民心向背的因素外，双方将领的军政素质，湘军亦远过于太平军，而将领的素质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军队的素质，这其中大帅曾国藩的表率作用，至关重要。他言传身教，躬亲垂范，以“引出一班正人，倡成一时风气”为己任，实践着顾炎武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的理念。

**十五、天下无湘不成军**

605

湘军将帅之廉勇，军纪之严格，是其勇猛善战的重要原因，亦使湘军威震天下。由此，战乱各省纷纷赴湖南募勇招兵，蔚然成风，故有“天下无湘不成军”之说。

**十六、朋僚幕友之间**

635

曾国藩重情谊，但也偶有意气用事的时候。他知人善任，以陶铸人才，转移风气为己任，其幕府犹如一高等学塾，学术气氛浓厚，颇能收教学相长之效。

**十七、大功克成之际（上）**

685

坐困愁城的洪秀全绝望而死后，天京陷落，门徒们各作鸟兽散，而在其愚民洗脑政策下成长起来的幼天王，被俘后大骂“长毛贼”，向敌人摇尾乞怜的行径，为太平天国的灭亡，添写了一个黑色幽默的结尾。

**十八、大功克成之际（下）**

721

太平天国引发的战乱，是举世罕见的一场浩劫。面对疮痍满目，百废待兴的局面，曾国藩奏请裁撤湘军，减免地方赋税，努力为百姓的休养生息营造宽松的政策环境，而他激流勇退，优游林下的愿望，却因中原军事态势的逆转而化作了泡影。

**十九、北上剿捻**

751

捻子兴衰起伏的历史与曾国藩治捻之策。曾国藩虽半途而退，未能葳其全功，但捻子最终还是亡于他“以有定之兵，治无定之贼”的战略。

**二十、教案与洋务**

793

在直隶总督任内，曾国藩遭遇了天津教案。他实事求是，确定了委曲求全，绝不与洋人开衅的办案方针。在当时情绪化的社会中，他承受着极大的误解与压力，但秉持理性与谈判解决的立场不变。曾国藩是自强运动的支持者与带头人，但他对洋务的认识，只局限于器物方面，为的是师夷长技，仍不脱一个农业社会中士大夫的眼界。

**二十一、风中残烛**

833

曾国藩晚年老病缠身，犹如风中的残烛，随时有可能熄灭。而其道德文章，已臻于大儒之境界。百年以下，曾国藩肉身虽朽，冢墓丘墟，而其功在中华，遗爱在民，为后人誉为“三不朽”之完人，其嘉言懿行已内化于我民族精神之中，成为中华文化复兴中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。

**附录：曾国藩家族世系简表**

870

**跋**

871

## 祁门之困

湘军兵困祁门，从曾国藩的日记中，我们看到这位外表镇静，指挥若定的大帅，无日不在忧危之中，那种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般的感受，实非局外人所能揣度。缺乏心理层面的认知，后人对历史伟人的了解，只能是表面的与肤浅的。



宿松聚会后，东征方略初定，曾国藩即于五月十五日拔营起行，移师皖南。中途，与杨载福、彭玉麟等水师将领及主持安庆军务的曾国荃等盘桓数日，于六月十一日抵达徽州祁门县。曾国藩所以移师皖南，是为将来规复江、浙作准备，且“皖南四府一州，土地富饶，民情淳厚，可战可守”。<sup>1</sup>之所以扎大营于祁门，则缘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。祁门位于万山丛中，四面环山，易守难攻。其西南与江西浮梁县接壤，有道路直通景德镇，而江西此时为湘军饷粮供给地，驻此便于粮饷之转输；其

东面经徽州有路分别通往浙江与宁国，为日后进军江浙之通路；其西北接建德、东流，可与黄石矶之湘军水师、安庆之陆师遥相呼应，倚为后援。

曾国藩此番出征，与以往不同，从前他只是带兵作战，此番身为总督，兼有地方民政之责。曾国藩多年做京官，做统帅，于地方行政全无经验。千头万绪，不知从何起手，他的想法也很简单，首重人才：“惟广求名将，以御寇氛；广求循吏，以苏民困。得一分则鄙人可免一分之咎，得十人百人，则地方渐受十分百分之福。”<sup>2</sup>而得知他得膺大位，朋僚故旧们在欣幸庆贺的同时，亦纷纷来信贡献意见。身在胡林翼幕府的



图 46：曾国藩当年驻节于祁门县敦仁里的行辕——洪家大屋今景。

丁取忠、蒋照、汪士铎<sup>3</sup>最先得到消息，曾国藩得知上谕的次日，三个人关于用人行政的意见就到了。

丁果臣信：任贤。取友。速行。告示。

蒋文若信：江西抚藩指名要。破格用左公。申似房瑄。蒋好帮手。速发。

汪梅村信：哀痛恻怛告示，一。裁官，裁绿营兵，二。和夷，三。以楚营法部勒江南之兵勇，四。严禁骚扰，宾礼才俊，五。粮台综核名实，局员以少为贵，举廉惩贪，六。核实保举，慎重名器，七。屏数术星卜之士，八。守碉卡险要，九。拙速疾驱，不可顿兵坚城，十。<sup>4</sup>

曾国藩在日记中所记，仅作备忘录，故极简略，笔者只能作一大概判断。丁取忠建议他从朋友中选用贤才，还要向军民发布告示，以示郑重。所谓“速行”，乃取孔子“君命召，不俟驾而行”之意，以示对朝廷的感激忠顺。蒋文若则建议他主动荐举江西省的巡抚、藩台（即布政使），为的是日后筹饷方便（曾国藩荐举沈葆楨，就含有这层用意）。在用人上，建议对左宗棠破格重用；至于信中提到的“申”、“蒋”二人，文献无征，不可考。可能是曾国藩信中问起过这两个人，蒋照把“申”比作房瑄，意思是做地方官尚可，打仗不可靠。房瑄是中唐时人，早年曾任县令，所在为政，兴利除害，有能名。安禄山之乱时，曾被重用为宰相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），自负其才，请纓带兵作战。但用兵素非其所长，房以虚名采择将吏，所用皆未尝习军旅之事者，以此致败。<sup>5</sup>

对朋友们的建议，曾国藩相当重视，而且不忘开个小玩笑。“当此大局震撼之际，读二君信，为之气壮。应即抄一通于座右，气馁时一为省览，鞭顽起懦，或者矮子一夕暴长也。”<sup>6</sup>尤其是汪士铎提的那十条，几乎一一认可。

来示所举十条，第一、第四条当于本月内行之，第二条裁官裁绿营，俟履苏日行之。第五条乃弟近年行军之微旨。第六条亦今世必变之恶俗。惟第三条和夷，或另简派有人。第九条修筑碉卡，事有未遑。第十条疾驱入吴，力实未逮，负阁下殷

殷期望之心。愧极愧极。仍望不我遗弃，续行详示。<sup>7</sup>

其老弟曾国荃，亦向他提了四条建议：饬道、府、州、县，函答现办何事，地方利弊如何，要隘如何，人才如何；讲求树畜；严札武营；自爱。<sup>8</sup>这几条均被他采入《居官要语》。不久后，汪、蒋又寄来了举荐的人才名单，其中汪士铎一人就举荐了二十三人。但临渴掘井，这些人才分布在四面八方，其中不少还在太平军占领区内，一时间难以罗致。故曾国藩还是着手先从朋友故旧中招纳人才。如王勋兄弟（即已故老湘营统领王鑫之弟）、郭崑焘、冯卓怀（树堂）、许振祜（仙屏）、程恒生（尚斋）、陈鼎（作梅）、邵懿辰（位西）、吴嘉宾（子序）等。

此番随曾国藩移师皖南的部队，计有鲍超的霆字营六千人，从多隆阿处抽调的礼字营千人，安庆朱品隆部两千五百人，加上护卫大营之亲兵营，计约万人。兵不算少，但亟缺独当一面的将才；而“无好统将、好营官，虽百炼精勇无益也”。<sup>9</sup>鲍超尚在四川省亲，左宗棠、张运兰、李元度在湖南，身边虽有一个李鸿章，但湘军的特点，如前所述，只有亲自招募者方能指挥自如，李鸿章是幕僚身份，又不是湖南人，根本指挥不动湘军。所以曾国藩后来要他去家乡招募准勇，作为基本部队，原因即在于此。

在行政方面，更是千头万绪。首先，清代地方大小衙门，都依中央六部的设置，设立一个办理公事的幕僚班子，其中最重要的是钱谷、刑名两项，前者负责粮赋征收，后者负责治安与民事刑案。军队里当然没有这样的人才，于是向老友胡林翼求助：“敝处须一刑名幕友，专办地方照例事件，尊意如有其人，求荐一位，本领不必甚高，但能精细有恒为妙。阁下平日训饬州县，其最得意之批（牍），望钞数十纸见惠，千万无吝。”<sup>10</sup>到祁门之后，他又立定公事规模：“派一员专管衙门公事，分别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六科，以六箱贮之。将来……以船为官署，将文卷概置其中，派司道大员管理。”<sup>11</sup>甚至州县官员，他也向胡林翼求助：“皖南州县亟需换人，而敝处竟无一人，必求于鄂吏中，惠赐上驷一人鹤九<sup>12</sup>精力好何如，中驷二人，迅派来皖。先换一县，树之风声，千乞勿吝。如公所最爱惜者，借才半年，仍可奉还，至恳至恳。”<sup>13</sup>

身为总督与钦差大臣，节制三省军事行政，手握重兵，位高权重，程度不够的人往往会得意忘形，而身边的人，更是会狐假虎威，仗势欺

人。曾国藩深知官场之陋习，从一开始便三令五申，严禁部属扰民。据其年谱所记，当时相关措置甚多。

刊发营制、营规，训饬各营将领士卒；刊发《居官要语》一编，训饬僚吏；密札司道，举劾属员；札各营统领，举劾营官哨弁，均得以密函上达。札饬道府州县官，访求地方利病、山川险要，留心所属绅民之才俊、田野之树畜。现前即应办理事件，均用书函答复。颁示告示，晓谕江南北士民凡六条：其一禁官民奢侈之习。谓吴中民俗好善，而遭祸之故，由于繁华。其二令绅民保举人才。以两江之才，足平两江之乱。其三安插流徙。凡衣冠右族、经生大儒与殉难死事之家，均令地方官加意存恤，贫乏者给予口食之资。其四求闻已过。凡己之过失与军中各弊端，许据实直告。其五旌表节义。于行营设立忠义局，委员采访，详核事实，或由地方官汇报，或由该家属亲邻径禀，随时汇案具奏。请建总祠总坊，其死事尤烈者，另建专祠专坊，以慰忠魂而维风化。其六禁止办团。军兴以来，各省团练未闻守城杀贼之功，徒有敛费扰民之害。自后非其地、非其人，毋得擅自举办，其从前各处练丁支领口粮者，概予裁撤。又出示晓谕军营兵勇，严禁骚扰，三令五申，词极恺切。接见守令各员，教之以廉静为体，以善听断为用。虽军事倥偬之时，而条理秩然不失也。<sup>14</sup>

曾国藩这些措置，颇有可供当今官场借鉴之处。如关心树、畜，“树”意指植被，植被好坏关乎环境，而环境关乎民生。“畜”，意指耕织而外的副业，百姓之贫富系之；故在农业社会中，六畜兴旺乃小康之标志。再有，新官员到任，在地方上绝对是件大事，百姓关注此事要比国家领导人是谁更甚，因为他之所作所为，关乎本地民生百业。我们看到，不少朋友建议他莅任后最先要做的事，是发告示，为什么？那时没有广播、电视，发告示就是亮相，就是将你的施政方针广而告之，要治下的官员、百姓都知道你来此做官，要干些什么，人们可以根据你的告示，衡量你的所为、你的政绩。现今传媒发达，而今日之地方官，你来我去，如走马灯一般；民众对官因何来，又为何去，茫然若无所知，对

其建树更无从评价，官民之隔膜、戒备遂由此而生。曾国藩告示中的六条，大多着眼于转移风气，如禁奢侈、举人才、求闻已过、旌表节义，等等；再就是严禁扰民，诸如禁止办团，禁军士骚扰民间，要地方官员以廉静为体，等等。廉，是廉洁；静，指无为而治，不生事，不扰民，自可与民休息。

至于严诫身边人与属下廉洁自律，且自身率先垂范，更是为官者题中应有之义。曾国藩为防微杜渐，与属下之巡捕、门印、签押等曾约法三章，<sup>15</sup>所幸的是，这篇告谕流传了下来，于今日官场，仍不失为借鉴，故全文逐录于下：

### 谕巡捕门房签押三条

凡为将帅者，以不骚扰百姓为第一义。凡为督抚者，以不需索属员为第一义。督抚与属员交涉，以巡捕、门印、签押三处为最。明日起早，经过地方，即是与州县交涉之始，兹特严定条约，愿巡捕、门印、签押敬听而牢记之。

第一，不许凌辱州县。人无贵贱贤愚，皆宜以礼貌相待。凡简慢傲惰，人施于己而不能堪者，己施于人，亦不能堪也。往尝见督抚过境，其巡捕、门印、签押及委员等，见州县官，皆有倨侮之色，严厉之声，实可痛恨。今当痛改恶习。凡见州县及文武属员，总以和颜逊词为主，不可稍涉傲慢，致启凌辱之渐。

第二，不许收受银礼。凡自爱者，丝毫不肯苟取于人。凡收人礼物，其初不过收茶叶、小菜之类，渐而收及鞍马、衣料，渐而收及金银、古玩。其初不过投赠之情，渐而笑索授意，渐而诛求逼勒，贿赂公行，皆始于此。嗣后我巡捕、门印、签押，务各自爱，不准收受丝毫礼物。即茶叶、小菜、至亲密友赠送微物，若非禀明本部堂再三斟酌者，概不准收。倘有隐瞒收受者，重则枷号棍责，轻则递解回籍。

第三，不许荐引私人。凡巡捕、门印、签押，势之所在，人或不敢不从。或其亲族，或其旧识，或荐至各将营盘，或荐入州县衙门，纵有过失，互相隐蔽，勾通袒护，为患甚大。自

此次告诫之后，概不准荐人入将领之营，入州县之署，亦不准各营各署收受。

以上三条，巡捕、门印、签押三处，各写一分（份），贴于座右。如其自度不能，即趁早告退；若其在此当差，即小心凛遵。本部堂既告戒，尔等亦加倍自行儆惕。凡接见文武属员，无论大小，虽至杂佐外委，亦必以礼貌相待，断不以厉色恶声加人。至送礼物者，一概谢绝不收。无论茶叶、小菜，以及裁料、衣服、书籍、字画、古玩、器皿、金银、食物，均皆不收。亦不准荐人入武员之营、文员之署。此三者，本部堂若犯其一，准各随员指摘谏诤，立即更改。

咸丰十年五月谕巡捕、门印、签押三处。<sup>16</sup>

对下属要求如此，则自己必得率先垂范。即古语所说，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虽令不从。曾国藩这个自觉是有的，“盖位愈高，则誉言日增，箴言日寡；望愈重，则责之者多，恕之者少”。在这封致家塾先生邓汪琼的信中，他请邓“常以药石之言相绳。弟每日行事，有日记一册，附家报中，阁下如有不谓为然之处，即恳逐条指示，不胜铭感”。<sup>17</sup>七月，在与友人陈鼐闲谈时，他提出“身旁须有一胸襟恬淡者，时时伺余之短，以相箴规，不使矜心生于不自觉”。<sup>18</sup>陈鼐是道光二十七年的进士，与李鸿章同年，淡于名利，因家累不仕，游幕于胡、曾幕中。曾的话，实际上含有试探之意，希望他能长留在自己身边，做一名诤友。<sup>19</sup>邓、陈都是无意于官场的“胸襟恬淡者”，壁立千仞，无欲则刚，这样的人无所求于他，所以才有可能不计利害地进言规谏。

还有件值得一提的事。曾国藩膺受重任，移师祁门后，后来撰述《湘军志》的王闿运忽然找上门来，在祁门一住就是两三个月。王闿运（1833~1916），字壬秋，又字壬父，号湘绮，湖南湘潭人。少孤，由叔父教养成人。九岁能文，后肄业于长沙城南书院，熟读经史。咸丰七年湖南乡试举人，负时誉；九年会试不第，为权臣肃顺聘入家塾，颇受礼遇。后又周旋于湘军诸将帅间。其人倜傥自喜，高自标置，好为人师。后以贫就食于四方，在多所书院讲学，门生众多，光宣间俨然耆老宿儒。辛亥革命后，曾为袁世凯征聘为国史馆馆长，后辞任还乡，逍遥故里，终年85岁。王受曾纪泽之托撰述《湘军志》，挟嫌恣意褒贬，于曾国藩

兄弟多贬义，纪事亦多舛误，颇訾物议；另有《湘绮楼诗文集》、《日记》传世。

当时，正值曾国藩需才孔亟之际，来了这么个大才子，曾国藩厚待之，时常与之长谈，请其吃饭，却偏偏不邀他入幕。<sup>20</sup>问题出在王与曾国藩气类不合。曾历来主张，“军营宜多用朴实少心窍之人，则风气易于淳正”。<sup>21</sup>又云：“观人之道，以朴实廉介为质，以其质而更辅以他长，斯为可贵；无其质则长处亦不足恃。”<sup>22</sup>王乃一自负文人，名利心甚重，谈诗论文尚可，到军营做事则不可。曾国藩明明知道王闾运所为何来，却视之为赵括之流，只拿他当个论文的朋友。久之，王自觉无趣，悻悻而去，但心里未尝不怨恨曾国藩之无情。王代功所撰《湘绮府君年谱》中，曾纪录了王在祁门所上的方略：

四月，曾文正公始授两江总督之命，进驻祁门。府君于八月出京往祁门视曾（不确，据曾氏日记，王早在六月初八日，即已赶到正向祁门行进中的曾国藩大营），则建议以为公前。言即日渡江以固吴会之人心，安庆去江宁、苏州均近于祁门，岂人心以远而固乎？宜从淮扬进规常（州）、镇（江）。使公弟国荃攻安庆，左宗棠出浙江，与皖相呼应，乃得形便。若不得已，亦宜驻徽州以固宁国之守。曾公念业已上奏，若遽改图，恐动军心；且张芾公在徽州，未便逼之，遂不听。已而宁国陷失，李文次青率师至徽州，官军败溃，徽州复陷。贼党环绕祁门，曾军几溃。知其事者，皆叹府君为先见焉。<sup>23</sup>

其实，王的主张无非是朝命之翻版，根本不可行。曾国藩若像他说的那样，孤军挺进苏南，怕是到不了目的地就会被太平军围歼。至于徽州失守，另有原因，绝非驻军祁门所致。曾国藩谢绝他的理由，明眼人一望即知是敷衍之辞。曾国藩从其建言中也肯定评断出，这不过是个纸上谈兵的家伙。诚如徐一士所论，王“为人固以知兵自负，好谈大略，少年时颇思赞襄军谋，腾骧政路，而挟策以干曾国藩等，率见为迂阔之谈，落落寡合，无所藉手，志愿弗克一酬，盖不能无缺望”。<sup>24</sup>此为他日后撰书褒贬人物以抒爱憎的种因。

多年后，在给左宗棠的信中，王尚余恨未消：“闾运行天下，见王

公大人众矣，皆无能求贤者。涤丈（即曾国藩）收人材不求人材，节下（指左宗棠）用人材不求人材，其余皆不足论此。以胡文忠（即胡林翼）之明果向道，尚不足知人材，何从而收之用之？故今世真能求贤者，闾运是也。而又在下贱，不与世事，性懒求进。力不能荐豪杰，以此知天下必不治也。”<sup>25</sup>似乎天下事舍我其谁，其狂傲自大，始终如一，绝无自省精神，这就难怪他要把此生之落魄，归咎于他人了。

曾国藩移师祁门之初，几员大将均不在身边。老湘营的张运兰七月二十四日到，李元度八月七日到，鲍超八月二十日到，而左宗棠部则迟至九月二十日才抵达江西景德镇。这也就是说，将近两三个月左右，曾国藩所部，处于有兵无将的状态。无得力统将的军队，比乌合之众强不了多少，太平军借击溃江南大营的声势，若乘虚进攻，以全力进军皖南，曾国藩的失败乃至被歼的可能性极大，若是那样，整个战局将为之大变。太平军为什么会错失了消灭湘军的天赐良机呢？攻克苏、常后，太平军在做些什么呢？

太平军被牵制于上海。此时的上海还只是个县城，隶于松江府。现今长江三角洲一带，清代划为苏松太道；苏即苏州府，松即松江府，太即太仓州。其时，苏州府、太仓州皆已落入太平军之手，而上海自南京条约后，开辟为五口通商的口岸之一，中外商贾云集，是东南最大的商埠与口岸，自然也是江海关税之利藪。据统计，自咸丰四年起，上海江海关每年的进出口税银收入都在一百几十万两左右。<sup>26</sup>江浙本来就是富庶之区，而上海可称是富中之富。但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是，上海有划给外国人住的租借地，而且驻有各国的使节，故对于列强而言，上海的安定与繁荣，与他们既得的经济与政治利益攸关。

太平军在攻占苏州、常州时，杀戮甚惨，难民们带来的消息，令上海人心大震。四月三日，新任的江苏布政使薛焕派苏松太道吴煦、上海知县刘郇膏请援于英、法驻上海领事，请他们助防上海。六日，英国公使普鲁斯（Bruce）法国公使布尔布隆（de Bourboulon）联名布告保卫上海，维护商业。七日，英法军队开始在上海附近布防；十日，英法公使宣布保卫上海租界，并分别向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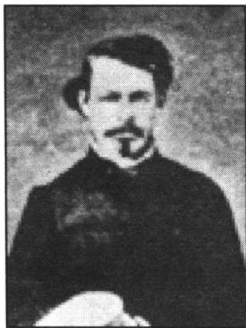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47：号称常胜军的洋枪队首领华尔（Word）像。



国政府报告。四月十三日，美国人华尔（Frederick Townsend Word）得到四明公所董事、候补道杨坊（宁波人，兼有官绅两重身份的上海巨商）、苏松太道吴煦的赞助，招募上海滩的外籍人，组成洋枪队，军需由上海官商供给，实际上是一支雇佣军，华尔的副手为法尔斯德（Edward Forrest）与白齐文（Henry Andrea Burge vine），均为美国人。<sup>27</sup>

五月十三日，太平军攻克松江府，逼近上海；二十八日，华尔的洋枪队随清军出动，共同克复松江。六月十三日，苏松太道吴煦派参将李恒嵩率勇万人，助洋枪队攻松江以北的青浦县，太平军守将周文嘉告急，十五日，李秀成遂率部自苏州往援，十六日大破洋枪队与清军，伤亡甚重，华尔亦身负五创。二十三日，白齐文、法尔斯德等再攻青浦，再败，退驻松江府城。三十日，李秀成以外国人违反中立，帮助清军为名，偕干王洪仁玕占领泗泾。英国公使普鲁斯致信李秀成，劝其勿攻上海，否则将予以迎击。七月二日，李秀成复信上海各国公使，声明进兵上海，不会扰及外国人。要外国人悬挂黄旗，以便于识别。当日，太平军三千人抵达上海徐家汇，一天主教徒与一法国传教士被杀，随即占领罗家湾，逼近上海城西、南两门。英法也以一千二百名士兵固守，因当日有大风雨，太平军没有立即攻城。

次日，太平军由三面围攻上海，焚江海关，进逼法租界；原拟内应之清军为薛焕所擒杀，太平军亦为英法联军所败。七月四日再攻上海城，太平军一度逼近英租界，旋为英军及守城兵勇所败；泊于黄浦江中的英国军舰发炮助战，李秀成受伤。五日，太平军退驻徐家汇。李秀成致书各国列强，责备其不守中立，并称到上海为的是与外国人商定条约，彼此原属同教（指同样信仰天父），此次乃事出误会，希望保持友好关系云云。<sup>28</sup>

李秀成想将上海收入囊中，为的是一举占领整个苏南，使太平军有个稳固的战略后方，依靠苏、浙、上海的财赋，太平军可与清军持久作战，而不必担心后勤给养。但他没有想到的是，太平天国早已丧失了夺取上海的良机，此时的列强各国，多已认明太平天国的异教本质，立场已经变了。站在大清朝廷一边，不仅既得的利益有保障，还可以趁乱攫取更多更大的利益（如海关由外国监管与在租界设立工部局等）；而和一个比清廷还要自大狂妄，且已渐入困境的政权为友，不仅未来前景难测，而且很可能连已经到手的权益也会失掉。显然，这是不符合列强国